

## 赵翼论“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

黄紫晴 余曆雄

拉曼大学中文系

### 内容摘要：

赵翼于《廿二史札记》的卷十九及二十评价唐代之兴衰，以〈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为首，通过论述贞观时期的直谏者与唐太宗之间的关系，以观当时广开言路的政治氛围。“贞观”乃唐代第二个年号，共计二十三年，但经本文分析，赵翼所谓的“贞观中”并非是整个贞观时期，而是更倾向于贞观初至贞观中期的时间节点。赵翼以十五人举例说明贞观时期的直谏者不止魏徵一人，其中包括薛收、孙伏伽、马周等人，其中有得厚赏、有赏及无赏者，另外又有太宗怒但纳其谏者。此条目虽论魏徵及十五位直谏者，但赵翼主要赞扬的对象是能纳谏的唐太宗。

### 关键词：

赵翼，魏徵，唐太宗，直谏，《廿二史札记》

## 前言

赵翼（1727年-1814年）、钱大昕（1728年-1804年）、王鸣盛（1722年-1797年）分别有《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著作，被世人称之为“乾嘉三大考史家”。钱大昕于《廿二史考异》中指出二十二史中文字烦多，如地名、官职今昔演变而异名，因此其书以“惟有实事求是，维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sup>1</sup>”为作书目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称：

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sup>2</sup>

为作书目的，因此钱大昕、王鸣盛二人治史目的为求是和考实，而赵翼不然。《廿二史札记》在《陔馀丛考》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来，杜维运于《清代史学及史家·赵翼之史学》道：

乾嘉之际，史家崇尚博雅，醉心考据，赵氏则不趋时风，不逐潮流，飘然世外，自树一帜。<sup>3</sup>

又于《赵翼传》中称：

赵翼是位诗人及史学家，所以《陔馀丛考》中的第五卷至二十九卷是精华，《廿二史札记》撰写于《陔馀丛考》之后，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即是在《陔馀丛考》史诸卷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sup>4</sup>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先道自己考史之法为

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sup>5</sup>

而其治史目的为：

<sup>1</sup> [清] 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页。

<sup>2</sup> [清] 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1页。

<sup>3</sup> 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市：东大图书，1984，第371页。

<sup>4</sup> 杜维运：《赵翼传》，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社，1983，第123页。

<sup>5</sup> [清] 赵翼著，王树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1页。

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sup>6</sup>

因此《廿二史札记》中除了考证以外，又有对历朝历代之兴衰的评价，此乃《廿二史札记》的一大特点。赵翼与钱大昕、王鸣盛虽同为考史，但其治史目的有所不同。《廿二史札记》始于汉史，终于明史，全书共三十六卷，其中唐史占了五卷，其论唐史以《旧唐书》及《新唐书》<sup>7</sup>为据。前三卷论两《唐史》记载之内容、书法、体例等，后两卷则是评唐代兴衰之事迹，以〈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为首个条目。所谓的“贞观”乃唐太宗（598年-649年）在位时期的年号，从贞观元年（627年）至二十三年（649年），共二十三年，但赵翼的“贞观中”是指贞观初期至贞观中期的时间节点，非二十三年的贞观年。

### 一、赵翼论直谏者首推魏徵

赵翼认为在贞观时期时，有许多的直谏者，因此道“观君臣间直可追都、兪、吁、咈之盛也<sup>8</sup>”，将太宗的贞观时期视为唐代之盛。首先，赵翼以“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徵<sup>9</sup>”作为开端，魏徵之贡献最为突出，因此先肯定魏徵（580年-643年）在贞观时期的作用。《旧唐书》对太宗曾有“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sup>10</sup>”一评价，指太宗用人不问出身，魏徵便是如此。魏征原先是窦建德<sup>11</sup>部下，后来成为李建成（589年-626年）的太子洗马，当时魏徵见太子功绩不如秦王，因此献计让太子去平定山东。武德九年（626年），建成在玄武门政变死后，

<sup>6</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页。

<sup>7</sup> 下文将以“两《唐书》”并称《旧唐书》及《新唐书》。

<sup>8</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8页。

<sup>9</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8页。

<sup>10</sup> [后晋] 刘昫：《太宗本纪》，《旧唐书》卷2，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63页。

<sup>11</sup> 窦建德（573年-621年），隋末割据首领之一，武德四年（621年）被秦王剿灭。

太宗便重用魏征，其直谏之数量更是成为了贞观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再者，《旧唐书·魏徵列传》评魏徵为人：

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sup>12</sup>《新唐书·魏徵列传》则称：

徵之谏，累数十馀万言，至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佞邪之乱忠也。<sup>13</sup>

两《唐书》皆赞扬魏徵，《新唐书》更是统计了魏徵在贞观之际的谏诤多达十馀万言，按史载，其中包括治乱存亡，知人善用等谏言，除了两《唐书》以外，又有《贞观政要》及《全唐文》现存魏徵之谏言。

自太宗重用魏征起，魏征在在十馀年间前后直谏了二百多事，为贞观之治带来了巨大的贡献。赵翼更是借《旧唐书·魏征传》载太宗曾对魏征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馀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sup>14</sup>一语中，道出魏征作为直谏者的尽责之处。魏徵二百余事的直谏，如贞观二年（628年）时，魏征任秘书监，其认为战乱以后典章纷杂，于是奏请太宗让自己与其他学者对古籍进行整理，数年之间，秘书图籍，粲然毕备<sup>15</sup>。再如，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过世葬于昭陵，太宗为了能缓解自己对文德皇后的思念之情，于是在宫中建起层观观望着昭陵。后来，太宗带着魏征到层观，魏征一句“以为陛下望献陵<sup>16</sup>”提醒太宗不要因思念亡妻而忽略了社稷，于是太宗毁掉了层观。范祖禹在《唐鉴》中，针对魏征的“以为陛下望献陵”评魏徵造次不忘纳之于善，恐其薄于孝而厚于爱也<sup>17</sup>，赞赏魏徵在这般情况下尚能纳谏。不仅如此，王夫之也认为唐朝在中末年时虽乱却不亡，原因是：

<sup>12</sup> [后晋] 刘昫：《魏徵列传》，《旧唐书》卷71，第2562-2563页。

<sup>13</sup> [宋] 欧阳修、宋祁：《魏徵列传》，《新唐书》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3885页。

<sup>14</sup> [后晋] 刘昫：《魏徵列传》，《旧唐书》卷71，第2547页。

<sup>15</sup> [后晋] 刘昫：《魏徵列传》，《旧唐书》卷71，第2548页。

<sup>16</sup> [宋] 欧阳修、宋祁：《魏徵列传》，《新唐书》卷97，第3871页。

<sup>17</sup> [宋] 范祖禹著，白林鹏、陆三强校注：《唐鉴》，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第50页。

以太宗为君，魏征为相，聊修仁义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辩归诚，不待尧、舜、汤、武也。垂之十馀世而虽乱不亡，事半功倍，孰谓后世之天下难兴言仁义哉？<sup>18</sup>

建国之初，从君王至臣子重视仁义，以致唐室社稷的根基得以巩固，因此后来的唐朝在遭遇宦官和方镇等危机时，任然能长时间立足于此，魏征与太宗在贞观时期的进谏及纳谏的作用功不可没。

其次，赵翼又借贞观十年（636年），魏征曾以病请辞，太宗将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而加砺焉<sup>19</sup>挽留魏征一语，赞颂魏征直谏的作用。后续，以贞观十三年（639年）时，魏征撰写《十渐不克终疏》指出魏征虽有病在身，但任然谨记作为直谏者的角色。《十渐不克终疏》指出了当时的太宗逐渐不克的行为，如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等，将早年与晚年太宗的行为进行比较，从而让太宗能意识到自己的弊病。赵翼借此感叹到：

至今所传十思、十渐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听纳之，此贞观君臣间直可追俞、吁、咈之盛也。<sup>20</sup>

这般勇于纳谏，逆龙鳞之人，这便是赵翼观贞观时期首推的魏征。太宗亦是惜才之君，其不仅挽留以病请辞的魏征，更是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时，魏征过世以后，太宗又留下：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殁逝，遂亡一镜矣！<sup>21</sup>  
一语，惋惜魏徵之离世。

<sup>18</sup>王夫之：《读通鉴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694页。

<sup>19</sup> [宋] 欧阳修、宋祁，《魏徵列传》，《新唐书》卷97，第3871页。

<sup>20</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8页。

<sup>21</sup> [后晋] 刘昫：《魏徵列传》，《旧唐书》卷71，第2561页。

## 二、赵翼论直谏者不止魏徵

赵翼肯定魏徵在贞观时期的贡献以后，又道“然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徵也<sup>22</sup>”，再以两《唐书》各传论之，其举薛收、孙伏伽、温彦博、虞世南等十五人直谏为例。以下将依据赵翼的〈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一列出其所举之直谏者，并增两《唐书》对谏言的时间记载。

序	直谏者	时间	谏事	太宗反应
1.	薛收 (? -624年)	武德四年 (621年)以后	谏猎。	帝即赐金四十铤以奖之。
2.	孙伏伽 (? -658年)	太宗初登帝位时	谏元师律罪不当死。	帝即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
3.	温彦博 (574年-637年)	贞观初	谏长安令杨纂失察罪不当死。	帝即赦之。
4.	虞世南 (558年-638年)	1. 贞观九年 (635年) 2. 贞观九年 (635年) 3. 无明确记载，但在贞观十二年 (638年)前。 4. 贞观八年 (634年)	1. 谏田猎。 2. 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 3. 谏宫体诗不宜作，恐天下从风而靡。 4. 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	帝尝曰“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sup>22</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8页。

5.	马周 (601年-648年)	无明确记载，但在贞观六年（632年）至贞观十一年（637年）年间	谏大安宫宜崇奉、宗庙宜亲祀、乐工王长通等不宜赐官。	帝购大宅直二百万者赐之。
6.	王珪 (570年-639年)	1. 贞观二年（629年） 2. 不详，但在贞观十三年（639年）前	1. 庐江王瑗姬侍侧，王珪曰“陛下知瑗杀其夫而取之以为非，奈何又令侍左右？” 2. 谏祖孝孙雅士，不宜令教女乐。	1. 帝即出之。 2. 帝虽责之，明日悔，语房元龄令群臣勿因此不言。
7.	姚思廉 (557年-637年)	不详，但在贞观九年（635年）前	谏幸九成宫。	赐帛五十疋。
8.	高季辅 (596年-654年)	贞观十七年（643年）	指陈时政得失	帝赐以钟乳一两，曰“卿以药石之言进，故以药石相报。”
9.	戴胄 (573-633年)	贞观五年（631年）	谏修洛阳宫	帝嘉之。
10	张玄素 (?-664年)	贞观四年（630年）	亦谏修洛阳宫，至以为甚于炀帝。	帝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卒兴，同归于乱耳。”帝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命罢役，赐帛二十疋。
11	褚遂良 (596年-658年)	1. 贞观十七年（643年）	1. 谏宠魏王泰太过 2. 谏告成东岳， 3. 张玄素令史出身帝问其履历，玄素惭不	1. 帝纳之。 2. 即罢封禅。

		2. 贞观十五年 (641年) 3. 贞观十四年 (640年)	能对，遂良谓“元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对群臣穷其门户。”	
12	张行成 (587年-653年)	贞观十五年(641年)前	帝常论山东人物，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宜以东西为限。”	帝善之，赐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
13	李乾佑 (生卒年不详)	贞观初	裴仁轨私役门夫，帝欲斩之，李乾佑奏罪不应死。	帝即免之。
14	柳范 (生卒年不详)	贞观中	权万纪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诛之，柳范曰“玄龄尚不能止陛下猎，岂可独罪万纪？”	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独召范慰谕之。
15	刘洎 (? -646年)	贞观十八年(644年)	帝好与群臣论难，刘洎力谏，帝诏答曰“轻物骄人，恐由于此，敬当虚怀改之。”洎又言“近来上书人，或面加穷诘，恐致阻进言之路。”	帝曰“卿言是也，当改之。”

表一：按赵翼于〈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中所举的十五人为例<sup>23</sup>。

太宗纳谏而有厚赏者，如薛收赐金四十铤、孙伏伽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马周赐以大宅二百万，又有太宗虽怒但纳谏者，如王圭及柳范二人，其余则是有赏或无赏但太宗纳之。赵翼以薛收谏猎，帝即赐金四十铤以奖之，为直谏者不止魏征的首个论据。赵翼虽以薛收获四十铤金为首个依据，但此事与其所标“贞观中”的时间点有些出入。薛收因谏猎被赐以黄金四十铤发生于武德六年（623年），此时的李世民为

<sup>23</sup>全文见于[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8-420页。

秦王，尚未登帝，而薛收在武德七年（624 年）便病逝，其非贞观时期的直谏者。其次，薛收在得四十铤金前便曾两次进谏秦王，第一次为武德四年（621 年），秦王讨王世充时，窦建德率兵救援王世充，形势紧张，秦王部将权其退兵，唯独薛收认为王世充与窦建德两贼连固，则伊洛间胜负未可岁月定也<sup>24</sup>，建议秦王出战攻破王、窦，秦王纳之，尔后战胜并擒获王、窦二人。秦王在唐初四处征战，王世充、窦建德为隋末军阀势力之一，占据河北一带，在纳薛收之谏后，秦王攻破河北，河北一带归唐朝所有。薛收第二次进谏为秦王入隋朝的宫室，感慨其奢靡，薛收便借此对秦王道出：

后主曾不能察，以万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取讥后代，以奢虐所致也。<sup>25</sup>

一语，以前朝的奢败劝谏秦王谨记勿要奢靡。再后来，才有赵翼所举的薛收上谏阻止秦王沉迷于游猎，被赐黄金四十铤一事，后来薛收在武德七年（624 年）病逝。此时李世民虽为秦王，尚未登帝，但其所赐的黄金四十铤并非只是薛收谏猎之赏，而是薛收在唐初，助作为秦王的李世民平定四方有功又劝其俭朴兴国之赏。赵翼在〈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条目中，虽以贞观为时间点，但却以薛收为先例，这主要表达了李世民在未登帝时，便能知人纳谏，甚至因此击败隋末遗留的势力而建唐室。

接着，赵翼以孙伏伽为第二例子，其以“孙伏伽谏元律师罪不当死，帝即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sup>26</sup>论之。按两《唐书·孙伏伽列传》载孙伏伽本为唐高祖之臣，武德元年（618 年），曾针对隋朝之灭，向高祖进谏治国三策<sup>27</sup>，高祖便命其为治书侍御史，兼赐帛三百匹。至贞观元年（627 年），太宗数次游猎，孙伏伽上谏劝阻，太宗览后大悦。

<sup>24</sup> [宋] 欧阳修、宋祁：《薛收列传》，《新唐书》卷 98，第 3891 页。

<sup>25</sup> [后晋] 刘昫：《薛收列传》，《旧唐书》卷 73，第 2588 页。

<sup>26</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 418 页。

<sup>27</sup> 一为向使修严父之法，开直言之路，选贤任能，赏罚得中、二为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三为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择而任之也。

无论是《新旧唐·孙伏伽列传》又或《新唐书·孙伏伽列传》对孙伏伽的生平记载大约是如此，两书的《孙伏伽列传》皆无载赵翼所提的太宗赐孙伏伽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之事迹。赵翼所用的资料源自于《新唐书·魏征列传》，是魏征与太宗的对话内容之一，亦是《新唐书》所新增之载。太宗初登帝位时，原要赐死臣子元律师，孙伏伽谏以为法不当死，于是太宗赐其兰陵公主园，尔后有人认为赏赐太厚，太宗则以“朕即位，未有谏者，是以赏之<sup>28</sup>”解释了赐兰陵公主园的原因。魏征借此事称太宗导人使谏也<sup>29</sup>，赵翼亦以此赞颂太宗初登帝时，臣能直谏，君能从谏的政治氛围。正如太宗所言登帝之际未有谏者，于是赏之，孙伏伽在此便是真正意义上的贞观时期的第一位直谏者。赵翼视贞观时期为唐朝之兴的原因无非是广开言路的政治环境，太宗赐孙伏伽以百万公主园便能得知太宗虽初登帝位，不但未有骄傲自满，反而是从谏如流，面对第一位勇于直谏之人亦赐于厚赏，以鼓励群臣进谏。

续薛收、孙伏伽后，厚赏者尚有马周一人，赵翼称：

马周谏大安宫宜崇奉，宗庙宜亲祀，乐工王长通等不宜赐官，帝购大宅直二百万者赐之。<sup>30</sup>

道马周谏三事以后得厚赏。马周原是武将常何的门客，贞观五年（631年），太宗让百官上书朝政之得失，马周替常何书写二十馀条事，后来便得到太宗赏识，贞观六年（632年），授监察御史，奉使称旨<sup>31</sup>。马周担监察御史以后，便上疏三件事，其一太上皇所居的大安宫在城外，而皇太子之宅却在城中，因此马周道“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sup>32</sup>。又以太上皇年事已高提醒太宗要尽孝道方可治天下。其二，又以“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基<sup>33</sup>”

<sup>28</sup> [宋] 欧阳修、宋祁：《魏徵列传》，《新唐书》卷 97，第 3873 页。

<sup>29</sup> [宋] 欧阳修、宋祁：《魏徵列传》，《新唐书》卷 97，第 3873 页。

<sup>30</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 418 页。

<sup>31</sup> [后晋] 刘昫：《马周列传》，《旧唐书》卷 74，第 2613 页。

<sup>32</sup> [后晋] 刘昫：《马周列传》，《旧唐书》卷 74，第 2613 页。

<sup>33</sup> [后晋] 刘昫：《马周列传》，《旧唐书》卷 74，第 2614 页。

道出圣人重祭祀，将祭祀视为尽孝之举，提醒太宗要改正不参与宗庙祭祀之行为。其三，弹劾乐工及驯养马匹之人，可厚赐钱帛，以富其家，而不可授高爵<sup>34</sup>，更不能让他们与朝臣同列。此乃赵翼所指的马周谏三事，尔后，太宗纳之，再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sup>35</sup>。马周在贞观时期的谏言不止此三事，再有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又上谏提倡节俭、减少赋税、重用良吏等治国之道，太宗一一纳谏，于是马周擢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sup>36</sup>。按史载马周的仕途顺利升迁，如贞观十五年（641年）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十八年（644年），迁中书令，依旧兼太子右庶子；二十一年（647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旧唐书·马周列传》中无太宗为马周购大宅之载，此载由《新唐书·马周列传》添增，载马周初为监察御史时，因家贫而无法购宅，

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万，周遽以闻，诏有司给直，并赐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sup>37</sup>

《新唐书》但未记具体时间，仅书此事发生于马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而赵翼取之。《新唐书·马周传》所增之载不仅如此，又增马周任监察御史时，吃鸡<sup>38</sup>事件、禁宵时设街鼓<sup>39</sup>及整顿京师秩序<sup>40</sup>，观太宗极其重用马周，因此马周得厚赏。

薛收为武德时期的直谏者，而孙伏伽、马周皆为贞观初期直谏者，三人能的厚赏之缘由是对太宗初登帝时启到了一定的作用。贞观时期的直谏者也非进谏便有赏，如赵翼所举的王珪及柳范便是进谏后，太宗怒之。按照赵翼所举例，王珪曾进谏两事，一为庐江王瑗之姬，二为祖孝

<sup>34</sup> [后晋]刘昫：《马周列传》，《旧唐书》卷74，第2615页。

<sup>35</sup> [后晋]刘昫：《马周列传》，《旧唐书》卷74，第2615页。

<sup>36</sup> [宋]欧阳修、宋祁：《马周列传》，《新唐书》，卷98，第3900页。

<sup>37</sup> [宋]欧阳修、宋祁：《马周列传》，《新唐书》，卷98，第3901页。

<sup>38</sup> 《新唐书·马周列传》载每行郡县，食必进鸡，小吏讼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县广费，食鸡尚何与？”榜吏斥之。

<sup>39</sup> 《新唐书·马周列传》载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冬冬鼓”

<sup>40</sup> 《新唐书·马周列传》载品官旧服止黄紫，于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

孙（562年-631年）。庐江王乃李瑗（586年-626年），唐高祖的堂侄，与建成相交，在玄武门政变以后，被人算计谋反，后来被擒，李瑗之姬亦被没入宫中，此姬妾本是李瑗杀其夫再纳为之。后来又将王瑗之姬纳入工资，而贞观初，王珪见李瑗之姬侍奉太宗，便出言直谏，通过杀人取其妻之事劝诫太宗要能明辨非对错。赵翼称：

王珪见庐江王姬侍侧，王珪曰“陛下知瑗杀其夫而取之以为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即出之。<sup>41</sup>

当中的“帝即出之”四字与两《唐书》之载有出入。观《旧唐书·王珪列传》载：

太宗尝闲居，与圭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圭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是为是耶，为非耶？”太宗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窃以圣心为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此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sup>42</sup>

《新唐书·王珪列传》也载：

它日进见，有美人侍帝侧，本庐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庐江不道，贼其夫而纳其室，何有不亡乎？”圭避席曰：“陛下以庐江为是邪？非邪？”帝曰：“杀人而取妻，乃问朕是非，何也？”对曰：“臣闻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庐江

<sup>41</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8页。

<sup>42</sup> [后晋] 刘昫：《王珪列传》，《旧唐书》卷70，第5228页。

之亡，其姬尚在，窃谓陛下以为是。审知其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sup>43</sup>

两《唐书》虽同记王珪见王瑗之姬后直谏，但两书皆未记太宗出王瑗之姬一事，甚至《旧唐书》有“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sup>44</sup>”一语。赵翼却道王珪谏李瑗之姬一事，写“帝即出之”四字，此与正史之载不同。又观赵翼撰作《廿二史札记》的治学法，主要以正史中的纪、传、表、志中，相互勘校，不用正史以外之载，但此处的“帝即出之”四字却不是以正史为据。再有《唐会要》亦记“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sup>45</sup>”。太宗放李瑗之姬之载最早见于《贞观政要》中，其载太宗听王珪直谏以后，太宗大悦，称为至言，遽令以美人还其亲族<sup>46</sup>。《资治通鉴》中采《贞观政要》之录，并注：

按太宗贤主，既重圭言，何得反弃而不用乎！且是人泛侍左右，又非嬖宠著名之人，太宗何爱而留之！今从贞观政要。<sup>47</sup>

一语。在《廿二史札记》成书以前，赵翼撰写《陔馀丛考》时，便会使用正史及正史以外之载，其中便包括《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史料，后来在撰写《廿二史札记》时亦受到影响。故此，赵翼对王珪谏李瑗之姬一事中，书“帝即出之”四字。

按史载太宗对王珪谏李瑗之姬，仅是重其言但无赏，后来王珪又谏祖孝孙，太宗反怒。太宗使祖孝孙教授宫女声乐，对结果不满，《新唐书·王珪列传》载：

王圭与温彦博同进曰：“孝孙，修谨士，陛下使教女乐，又责譙之，天下其以士为轻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周上，为人游说邪？”彦博惧，谢罪，圭不谢，曰：“臣本事前宫，罪当

<sup>43</sup> [宋] 欧阳修、宋祁：《王珪列传》，《新唐书》卷 98，第 3888 页。

<sup>44</sup> [后晋] 刘昫：《王珪列传》，《旧唐书》卷 70，第 5228 页。

<sup>45</sup> [宋] 王溥：《唐会要》卷 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 1059 页。

<sup>46</sup> [唐] 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 2，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92 页。

<sup>47</sup>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3，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 6060 页。

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枢密，责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帝默然惭，遂罢。明日，语房玄龄曰：“昔武王不用夷、齐，宣王杀杜伯，自古帝王纳谏固难矣。朕夙夜庶几于前圣，昨责圭等，痛自悔，公等勿愆是不进谏也！”<sup>48</sup>

王圭与温彦博同谏，太宗怒后，温彦博谢罪而王圭不谢，更道出“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sup>49</sup>”一语，因此赵翼所称的“王圭谏祖孝孙雅士，不宜令教女乐<sup>50</sup>”，并非指针对祖孝孙之事，而是对君臣纳谏直谏的问题而论。赵翼对王圭谏祖孝孙一事中，真正的目的在于其后半句，其称“帝虽责之，明日悔，语房元龄令群臣勿因此不言<sup>51</sup>”。太宗虽怒，但赵翼通过“帝即出之”及“帝明日悔”两事中，观太宗在贞观初，对谏言的重视及心态。不仅如此，赵翼又以柳范为例，论贞观时太宗因其谏言而怒。两《唐书》中并无柳范独立之传，其事迹附于《旧唐书·柳亨列传》及《新唐书·柳泽列传》中，虽附于不同人之下，但两书皆记同一事，而赵翼引之。赵翼称：

叔万纪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诛之，柳范曰“房玄龄尚不能止陛下猎，岂可独罪万纪？”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独召范慰谕之。<sup>52</sup>

史载太宗之后，

独引范谓曰：“何得逆折我？”范曰：“臣闻主圣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直。”太宗意乃解。<sup>53</sup>

太宗对柳范之进谏虽怒，但后来又纳之，按两《唐书》之载，此时发生于贞观中期，而柳范任侍御史一职。此乃赵翼所举，贞观中太宗对直谏者虽怒但未罚直谏者之例。

<sup>48</sup> [宋] 欧阳修、宋祁：《王圭列传》，《新唐书》卷 98，第 3888 页。

<sup>49</sup> [宋] 欧阳修、宋祁：《王圭列传》，《新唐书》卷 98，第 3888 页。

<sup>50</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 418 页。

<sup>51</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 418 页。

<sup>52</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 419 页。

<sup>53</sup> [后晋] 刘昫：《柳亨列传》，《旧唐书》卷 77，第 2681 页。

再者，赵翼的举例中，又有在贞观时，直谏有赏与无赏者，其中有赏的有姚思廉、高季辅、张玄素、张行成，而无赏但纳谏则有温彦博、虞世南、戴胄、褚遂良、李乾佑、刘洎。如赵翼称：

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宫体诗不宜作，恐天下从风而靡、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帝尝曰“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sup>54</sup>

以虞世南为例，道出其在贞观九年（635年）至十一年（637年）间的四次进谏。按史载在贞观七年（633年）时，虞世南“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sup>55</sup>，因此太宗才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sup>56</sup>一语，太宗此言与赵翼所举的虞世南四次进谏之时间不同，太宗虽无赏，但频频纳谏并器重虞世南。再如贞观四年及五年，张玄素和戴胄前后进谏修洛阳宫一事。太宗有意重修洛阳宫，而戴胄和张玄素二人皆进谏阻止，劝诫太宗要体恤百姓，免去劳役之苦。赵翼虽道太宗仅赞许戴胄之谏，但于《旧唐书·戴胄传》中，太宗赞许之后又对侍臣曰：

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进官爵，以酬厥诚耳。<sup>57</sup>

因此戴胄谏洛阳宫一事并非只获“帝嘉之”。除了张玄素和戴胄谏修洛阳宫以外，在《新唐书·魏徵列传》中又载皇甫德参<sup>58</sup>曾上书称“修洛阳宫，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宫中所化也”<sup>59</sup>。其中反对修洛阳宫一事，太宗见后大怒，魏徵见状便称皇甫德参虽言辞过激，但陛下要理解皇甫德参只是个县丞却敢于上书进谏之心，后来太宗也因

<sup>54</sup>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8页。

<sup>55</sup> [后晋]刘昫：《虞世南列传》，《旧唐书》卷72，第2566页。

<sup>56</sup> [后晋]刘昫：《虞世南列传》，《旧唐书》卷72，第2566页。

<sup>57</sup> [后晋]刘昫：《戴胄列传》，《旧唐书》卷70，第2534页。

<sup>58</sup> 生卒年不详，又见于《贞观政要》载贞观八年（634）时，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太宗以为讪谤，尔后魏徵为其进言，帝赐德参帛二十段。详见于[唐]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2，第106页。

<sup>59</sup> [宋]欧阳修、宋祁：《魏徵列传》《新唐书》卷97，第3873页。

此停止修建洛阳宫一事。从几处史载中，可得知太宗在贞观时期，有意修建洛阳宫，但有进谏修洛阳宫时，仍然纳之。

赵翼以十五人之进谏论贞观时期的直谏者不止魏徵一人，但其所举之例，实在是论“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sup>60</sup>”的观点。赵翼又推太宗之所以能从谏如流的原因是太宗亲见隋炀帝之恶谏，以致丧国亡身，因此评太宗：

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sup>61</sup>

赵翼以隋朝臣子苏威、萧瑀、董纯等人进谏而遭隋炀帝之罚，论证太宗深知隋朝之灭，追本溯源乃“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谬”<sup>62</sup>。故此太宗登帝以后纳谏如流，帝王可纳谏，自有勇于直谏者，如房玄龄、杜如晦、韦挺等人，因此贞观时期直谏者不止魏徵一人，而是一群直谏者，赵翼仅举其中十五人为例。两《唐书》对太宗之纳谏却有不同评价，《旧唐书·太宗纪》称太宗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sup>63</sup>，《新唐书·太宗纪》对太宗之纳谏却一字不提，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对《新唐书》批评到：

太宗之美莫大于纳谏，《旧》纪史臣称其从善如流，最当。《新》赞一字不及，非也。<sup>64</sup>

赵翼通过臣之谏及君之纳与赏的关系，观贞观时期的政治氛围，也作出独是仁善之君则能纳谏；英睿之主每难进言<sup>65</sup>的评价。

<sup>60</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9页。

<sup>61</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9页。

<sup>62</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9页。

<sup>63</sup> [后晋] 刘昫：《太宗本纪》，《旧唐书》卷3，第63页。

<sup>64</sup> [清] 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70，第606页。

<sup>65</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9页。

## 结语

综上所述，赵翼虽称“直谏者不止魏徵”，但实在是赞扬贞观时期的太宗能纳谏之举，而赵翼所言的“贞观中”，更倾向于贞观初至贞观中期的时间点，非整个贞观时期，在其所举的除了魏徵以外的十五人直谏者中，唯有刘洎在贞观十八年（644年）的谏言是较为接近贞观末年的，往下再无举例。有学者称唐太宗在贞观十一年（636年）起，有着明显的前后期之分<sup>66</sup>，而赵翼借《新唐书·魏徵传》在贞观中期时，魏徵道贞观初至贞观三年（629年）以后太宗从谏如流，而近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也<sup>67</sup>，以此指出太宗在贞观中期以后不如之前的从谏如流。赵翼评太宗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sup>68</sup>。最后，赵翼载以“然则惧生于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做，人主大抵皆然”<sup>69</sup>总结整个贞观时期，君与臣，纳谏与直谏的政治氛围。建唐初，太宗因前朝恶谏之经验而引以为戒，平定四方，安稳已久后，太宗自满而无法再如初期一样纳谏。

## 参考书目

[唐] 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后晋]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sup>66</sup> 详见于赵克要、许道勋著：《唐太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第120-124页。

<sup>67</sup> [宋] 欧阳修、宋祁：《魏徵列传》，《新唐书》卷97，第3873页。

<sup>68</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20页。

<sup>69</sup>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20页。

[宋] 范祖禹著；白林鹏、陆三强校注，《唐鉴》，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 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王夫之，《读通鉴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

[清] 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清] 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市：东大图书，1984年。

杜维运：《赵翼传》，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社，1983年。

赵克要、许道勋著，《唐太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Zhao Yi on "Wei Zheng was not the only Direct Remonstrator 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OOI ZI QING      ER LEE SI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 **Abstract**

Zhao Yi, in the 19th and 20th volumes of *"Records of the Twenty-two Historiographies"* evaluat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ang Dynasty, applying the idea that "Wei Zheng was not the only remonstrator 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as the centrepiece.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monstrators and Emperor Taizong 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we can observe the open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at time, where dissenting opinions were welcomed. "Zhenguan" was the second reign title of the Tang Dynasty, lasting for a total of twenty-three years. Howe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it is evident that Zhao Yi's term "Zhenguan Zhong" does not encompass the entire Zhenguan period; rather, it tends to refer to the early to mid-Zhenguan era. Zhao Yi provides examples of fifteen individuals to illustrate that 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there were more than just Wei Zheng as remonstrators. Among them were Xue Shou, Sun Fujia, Ma Zhou, and others. Some of them were generously rewarded, some partially rewarded, and some received no rewards at all. Additionally, there were instances where Emperor Taizong heeded their advice despite being angry. Although this passage discusses Wei Zheng and fifteen other remonstrators, Zhao Yi's primary praise is directed towards Emperor Taizong's ability to accept counsel.

### **Keywords**

Zhao Yi, Wei Zheng, Emperor Taizong, remonstrators, *"Records of the Twenty-two Historiographies"*